

清朝灭亡后,百万清军去哪了

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(1912年2月12日),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,清朝统治正式终结。此时,清廷麾下仍存有号称近百万的各类军队,主要包括八旗、绿营等旧式武装,以及甲午战争后逐步编练的新式陆军、巡防营等。这些部队在王朝崩塌之际,究竟流向何方?

裁旧练新

清廷直接管辖的军队有八旗、绿营两个体系,八旗兵员极其有限,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,不堪征战重任。绿营军由“兵”组成,基本战略单位是镇,编制单位是营。

据学者研究,八旗、绿营为清廷的常备部队,总数有百万之众。其中绿营军“每兵一名,月支亦在五两上下”,耗费巨大却无纪律,同样充斥着腐败懒散之风,也近乎丧失战斗力。

从19世纪中叶开始,由于外敌入侵日益强烈以及清朝内部民变频发,清廷逐渐加强对各省驻防旗兵的整顿和训练,但效果不尽如人意。

经历了太平军、英法联军的“冲击”后,“兴办团练”之风盛行,湘军、淮军逐渐兴起。

1853年,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招募农民为勇、由绅士管带、兵随将转、兵为将有的湘军。1862年,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,淮军在营制上基本仿照湘军,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。

在晚清的时代浪潮中,湘军、淮军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,但甲午一役击碎了旧式军队的幻想,裁撤和改编成

为旧式军队的最终结局。从1895年起,清廷就仿照西方,改革军队。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,可称其发端,直至清朝灭亡,全国共编练14镇18协4标,共计17万余人。

除了被编练为新军外,这百万军队还能去哪儿呢?

其一为改编成巡警,充任地方保卫。即从绿营兵中挑选合格的警备人员,分批培训,逐渐推广,起到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。其二为编练巡防营(队)。此外,计口授田、设立工艺技艺所、开设学堂等也成为安置这批旧式军队的重要方式。旧式的八旗、绿营等通过以上这些渠道和方式逐渐走入社会。

新式军队

那么,那些编练的新军又走向了何处?

各地编练的新军(主要为陆军)除吸收和遴选旧式军队外,也从各地征募。就全国范围而言,清末的新军可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(主要为南方新军)两大系统。其中北洋新军主要包括北洋六镇、江北新军、直隶新军、山东新军、河南新军、东北新军、京畿新军。

但清廷对新军的制约力较弱,清末编练新军的经费也依靠地方自筹,这使得私人对于军队的影响更深。

清朝学者刘锦藻在编纂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中曾感叹:“自光绪年间开始改建新式军队,朝廷是因外敌侵袭的危机而警惕,不惜抛弃原有传统、效法西方模式,本以为军制焕然一新,就

能重振军队斗志;谁能料到,最终军权大权旁落他人之手,祸患反而潜伏在朝廷内部。”

同时,得益于大量军事学堂的创办,新军知识化程度普遍提高,他们对于军队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。很多新军士兵后来加入革命党,成为发动新军起义的主要力量。

1911年10月10日,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,随后建立革命军政府。其他省的新军如湖南新军、陕西新军、江苏新军、江西新军、云南新军、山西新军等纷纷响应并取得成功,清政府统治陷入危机之中。

武昌起义爆发后,由于南方新军大部分倒向革命,清廷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,袁世凯及其北洋军已经上升为“第三种力量”,影响时局走向。

1912年1月26日,由段祺瑞领衔的46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清廷,要求其明降谕旨,宣示中外,立定共和政体。

北洋军阀与新军有着直接的联系,从某种程度上讲,新军编练造就了北洋军阀的形成。袁世凯以新建陆军为蓝本,编练武卫右军、武卫右军先锋队、北洋常备军,最后形成北洋六镇,逐渐形成一支“私人化”性质的军队,辛亥革命后依靠这批力量走向舞台中央。

总的来说,旧式军队(八旗、绿营等)或裁或改,不再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。而新式军队,特别是其核心——北洋系,则直接变为北洋军阀,成为后续民国初期政治舞台的主导者;南方新

军则多成为革命党人武装或地方军事力量的基础。

旗帜变换

在百万清军消散于历史烟云之际,无数个体的命运也随之沉浮。蒋维平的一生,便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。

他生于清末,19岁那年,他相信刀枪可以救国,于是投身行伍。从李鸿章的淮军旧部,到袁世凯、段祺瑞的北洋阵营,他亲身经历了一个旧时代的崩塌与新军阀的混战。

二十余年戎马,他看够了旗帜的变换与理想的破灭,最终解甲归田。他收起军装,拿起医书,办起了红十字会,仿佛要将前半生的硝烟都沉淀在药香里。

时局变换,卢沟桥事变爆发,蒋维平积极参与抗日斗争,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。1938年八路军挺进平西,年届六旬的他为实现抗日夙愿,毅然关闭药店,携带全部药品参加八路军,从事医务工作,而后在南泥湾,他又带领官兵开荒种药,将不毛之地变成生命之田。

他的人生,或许也为“百万清军去哪儿了”这个问题,增添了一个充满韧性的答案。

百万清军,由满汉蒙等各族人民组成,是一群活生生的人,除了在战争中死去的,他们并不会随着清朝的灭亡突然消失,他们只是被历史的“无形之手”重新排列,有的没入市井,有的化身革命之火,有的沦为军阀棋子,也有的,在破碎山河间找到新的奔赴目标。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林昭华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标志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

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

1986年4月26日凌晨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,成为人类核能利用史上最惨重的灾难。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,我(周晓沛)曾随同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基辅,商谈有关两国建交事宜。7年后,我被任命为中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。

2000年初一个周日,乌克兰外交部组织驻基辅外交使团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。2月8日清晨,我们乘大巴北行。该站距基辅90余公里。约两小时后抵达设有武装岗哨的检查站。事故发生后,当局将电站周边30公里划为“核隔离区”(即“死亡区”),围以两米多高的铁丝网,严禁随意进入。

进入“死亡区”后,景象并非想象中可怕:草木依旧茂盛,未见明显动植物畸形。据介绍,两年前17匹蒙古野马被引入此地并成功繁衍,区内现有动物400多种,包括禽类280种和濒危物种50种。远处可见零星民居与耕地——尽管政府已强制疏散居民,但部分老人因不习惯搬迁生活而陆续回迁。

接近核电站时,又经一道岗哨严格检查。按行程,我们先参观原电站员工居住的普里皮亚季城。该城距电站不到5公里,曾住有5万居民,一度被誉为“最年轻的城市”,却因事故成为“最短命的城市”。汽车缓缓驶入无人街区,满目疮痍令人震撼:街道两旁商店旅馆空荡,宿舍破损,文化宫杂乱废弃,

垃圾堆积如山……

随后,我们来到由办公楼与四组机组相连的乳白色建筑群前——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。主楼前矗立着列宁像,门上方保留着苏联国徽,铜匾上刻有“苏联原子能部切尔诺贝利列宁核电站”字样。一切仿佛凝固在14年前:1986年4月26日1时23分44秒,正是综合体另一端的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,导致8吨多放射性物质泄漏,给人员、经济与生态带来巨大灾难。

稍后,我们乘车前往核电站4号机组。不久,一座奇特灰色巨构映入眼帘——即戒备森严的“石棺”。它高75米、宽110米、长160米,内部封存着爆炸的4号反应堆。当年为扑灭大火,政府动用军队与直升机,经200多天奋战,消耗5000多吨钢材、浇筑36万吨混凝土,方筑起这座“石棺”。

因辐射风险,乌方不安排近前查看。在专家指导下,我们更衣换上白色内衣、工作服、黑色棉外套、高筒套鞋,佩戴防毒口罩、手套、头盔与放射性剂量测试笔。

踏入昏暗的控制室,呼吸为之一窒。此处控制台仪表七零八落,残存设备锈迹斑斑,剥落墙面上隐约可见抢险人员签名。无人敢细看,唯觉阴冷潮气扑面。参观结束,电站人员检测确认测试笔读数正常,所受辐射量仅相当于一次X光检查,众人紧张顿消。据《世界博览》周晓沛/文